

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

重庆的科举

吴洪成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

重庆的科举

吴洪成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吴洪成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621-4046-7

I. 重... II. 吴... III. 教育史-重庆市 IV. G527.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6004 号

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

重庆的科举

吴洪成 著

责任编辑: 关长易

封面设计: 戴永曦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www.xsclps.com)

(重庆·北碚 邮编: 400715)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总 印 张: 35.375

总 字 数: 82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4046-7

总定价: 80.00 元

《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研究书系

总 序

重庆是中国长江上游的区域中心、连接中西部的纽带。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中，重庆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她是一座历史古城，又是一个拥有广袤地域的年轻直辖市。重庆的历史如歌如梦，重庆的文化悠久灿烂，重庆的文明积淀深厚，这一切都是今日新重庆迈向现代化小康社会征程的丰富遗产、宝贵资源。重庆的教育既是重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文明、发展文化、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方式。本书系将主要研究从巴国到清代的重庆教育史。

“研究书系”在体例设计及编排上突破通史或普通地方史以历史年代的线索和时间为主线书写历史的模式，而是以专题为重心，突出教育历史的制度、人物、思想及教育活动的嬗变以及深层的社会与教育的动因。为此，我们拟将书系分为相对独立又互为联系的四部著作：《重庆的书院》、《重庆的科举》、《重庆的学校》、《重庆的教育家与教育人物》。这既涵盖了特定历史时期重庆的教育制度及教育实践，又反映了重庆教育人物的思想及事业，尤其展示了重庆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改造、转换与变动的艰难曲折过程。这样，重庆教育历史的生动画卷就被巧妙地绘制。重庆教育风云的激荡、教育制度思想的变幻、教育人物及其活动的波折起伏，被冶

于一炉。“书系”描摹出了地方教育多姿多彩的生动、感人图景,发人深思、动人心魄、予人启迪。

“书系”的研究者已搜索了古代、近代有关重庆区域历史的方志典籍,当代四川、重庆的有关地方史志文献资料以及各个时期对该地区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论著。作者们在严谨考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史论结合,深入剖析,并采用文献法、比较法、计量分析、田野考察、个案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本着历史服务于现实、以古鉴今的治史原则,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科学主义的精神叙述、刻画重庆教育历史,充分体现现实感及实效性,并注重运用当代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理论、概念及知识来解读、分析、阐发重庆教育史演变的轨迹、阶段的特点及发展的规律,以使论著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四册书稿由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吴洪成教授主持,他独立撰写了《重庆的科举》、《重庆的学校》、《重庆的教育家与教育人物》三部,并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研究生张阔合作撰写了《重庆的书院》。我们力求全面、详尽并深刻地研究重庆教育历史,相信这不仅有助于区域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推动重庆教育现代化的改革事业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

绪 论

“科举”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据说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或称“九品中正制”。与前代考评人才体制相比较，科举又被认为是一场革命性变革，选拔方式由推荐为主转为以考试为中心，变得更具客观性、标准化。科举制度自唐代全面推行以来，直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敲响丧钟，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是与封建中古时期直至没落衰亡的清末历史进程相伴相随的。

科举的多学科研究特色非常明显。由于社会政治体制有赖于官吏选拔及其被选者的才学能力与素质，社会史、政治史中探讨科举便顺理成章；而科举制度本身是人的教育、培养问题，直接关乎教育的体制及内容和组织方法，教育史自应加强研究，并着眼于教育学、心理学理论阐述；此外，科举科目及测试组织方法等影响了文学、艺术、哲学、语言文学、心理学乃至经济、宗教等相关内容，各门学科的特定视野考察十分必要，于是乎涌现了各有特色的成果。科举及其内容、观念，曾几何时风靡神州角落、各行各业，牵动千家万户。从稚童到白发老翁，从妙龄少女到沧桑慈母，以及山野书生、学校学子、耕读传家，林林总总等各色人物，都对它千呼万应。走向科举或关注科举，是当时的风尚民俗、教化熏陶、价值导向、伦理精神、文化积淀，还是当时一种社会文化、民众心理。总

之,科举是社会动员与个体冲动的糅合,它究竟制造了多少林下悄语、月下娓娓、灯火红袖、慈母叮咛、家庭悲欢、宗族变迁,细述万千、细微描画。科举虽已然似滔滔江水,不再回转,然世纪之交,万象更新,征程伊始,又不断引起学者、文人的缅怀、联想、反思、总结,乃至纪念与咏唱。这些情形能从近一二年间出版科举论著及国际会议论文集的议论文字、激扬观点、拓展问题、繁富著述等得以证明之,此处不再赘述。

当今,科举制研究论著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它们各有特色,显现出争艳斗奇,又互相补充的态势。主要包括:以科举制为直接对象的研究,既有全国整体性,也有断代的,但以宋代及清代为主,对近代科举的改革与命运论述不足;在各专门学科历史如教育史、政治史、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当中,将科举作为学科体系或内容的一部分,注重从学科视野论其地位及角色作用,以教育史论述为多,其深刻性及理论水平也似乎比文学史、社会史高出一筹;通史或地方史志的论著中某一部分或专章探讨科举制,往往从历史学的方法加以记录与分析,这类研究目前已关注用现代西方新史学流派为某种依据,加强科学化与人文性的结合,历史感与现实性的交织,然而体裁以叙述或描写为主,思辨及理论化水平还有待提升;以地区为单位科举制的挖掘、整理及初步研究,这应该是一种新的进展、推进,也是创新,并且带有实用性与商品化价值,这种层面难度大,成果少,目前所见主要是单篇论文,以著作形式出现的以福建、江苏、浙江地区较突出,而以地域文化的探究又偏于进士科或状元制的介绍、清理。科举制集大成的研究成果是刘海峰教授著的《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据称刘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开设有“科举学”公选课,可谓匠心独运,情有独钟,但对青年学子讲授科举入仕的问题,应有度数,倘泛滥过剩,也会出现偏颇,不适合于当今社会开放、市场创新的主流观念

与国际化、现代化的大潮,故而应严肃认真和缜密稳重。

西南地区是中国内陆腹心的重要区域,形成了以巴蜀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地带。这一地区以成都、重庆两个国际大都市为中心,辐射周边,连带农村区域,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和承续转换重心。人才资源成为该地区社会进步、区域开发、民族腾飞、科技增长、经济振兴、教育兴旺等诸多领域现代化的关键。历史地考察人才问题,有助于当地当代人才的培养、选用及开发。而由古代至清末的社会精英或文化哲人,大都来自科举,这样区域科举制的探求与现实社会发展便发生了难分难舍的关系。本书只应了古人所言:“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首次集中整理、思索重庆这一西南东部地带、长江黄金水道上游最大港口与物资贸易中心、文化教育汇聚地的科举制历程,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且费时多,所得微弱,真有不堪回首之慨。客观地说,对科举及第人物的记载及相关研究材料最集中的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上科举考试及第数量及成就影响的自身原因,也有学者文人关注或兴趣的偏颇失缺,是难以叙述明白的。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重庆是西部落后地区,科举及第人物稀微,不成气候,难登大雅之堂。我想,这种观念值得商榷,应予重新估价,并应有转变。曾几何时,作为大西南中枢纽带的重庆承东接西,续北连南,是三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汇聚、争鸣的聚散中心。传统巴渝文化、巴楚文化独具魅力,被一些学者认为自成体系,成为三峡地区文化的渊藪、摇篮,给其他亚文化以丰厚的滋养。唐宋以后,重庆战略地位提高,政治意义增强,长江、嘉陵江、涪江诸大水系商业沟通频繁、贸易交流旺盛,其工商业发展水平提升,并逐渐翘首西南,乃至辐射到中国西部广袤的山川坝野、城镇村落。在这种社会历史变迁纷纭交错的态势下,重庆的学校、文学、科举等诸种领域、各项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唐代政府赋税

“扬一益二”的古语，即言扬州、成都经济水平之高及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隆。重庆毗邻成都，应得其余绪。到了宋代以后，重庆的发展异军突起，逐渐呈现出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互为犄角，鼎足抗衡，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之态势。科举制一经实施，重庆区县即有人应试及第，而众多他乡科第士子往返三峡、嘉陵，留下了千古绝唱。他们吸纳了巴人竹枝文学的风格，又添增了古代文学胜景之风采。宋代重庆科举中举人数激增，遭元削弱后，明代以降直至清末又有所攀升。这些“登龙门”的天子得意门生曾在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也为开发西南、振兴乡梓付出了一定辛劳。直到今天的巴渝大地仍有一些传闻，也残留了文物遗址，让人追忆、缅怀、思绪不已……这些片断的记载文字，虽然只是一鳞半爪，过于简略，然而略加梳理，适当分析，却也能反映重庆古代科举之大观，刻画重庆士子的读书生活及精神状态。探索重庆的科举，能丰富巴渝文化的识见，充实区域教育的内容，拓展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域，弥补中国古代科举制研究中西部观照的薄弱乃至残缺。而从现实性上说，也能多少起到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区域文化建设，教育改革，人才资源的培育、选任及使用等方面发挥一定参考价值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搜索了古代、近代有关重庆区域历史的方志典籍，当代四川、重庆的有关地方史志文献资料以及各个时期对该地区有关科举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论著，在严谨考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史论结合，深入剖析，并采用文献法、比较法、计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本着历史服务于现实、以古鉴今的治史原则，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科学主义的精神叙述重庆科举历史，并注重运用当代教育学理论、概

念及知识来解读、分析、阐发重庆科举中的诸多教育问题。

诚然,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水平又有限,本书从史料的搜求到整理分析,虽然费却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与原本设想的目标肯定会存在不小的距离。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屈原在《离骚》中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中国科举史的研究及探索,前辈及时贤已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留下许多空白地带与薄弱环节,尤其是科举的区域历史,科举的个案研究,科举与文化的学术变动及科举对地方民众思想观念、民间风俗习尚的形成的影响等方面更显得贫乏或不足。我们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艰辛探求、不懈努力,沿着这条漫长而不平坦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行,去攻克那些未被我们所认识的相关领域的迷离。

研究工作在资料挖掘过程中曾得到原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我国知名教育史专家李定开教授的帮助,责任编辑认真细致与扎实严谨的工作风范也使我倍感钦佩。所有这些,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吴洪成笔记于

近代历史名城保定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2007年5月3日

目 录

总 序	吴洪成	(1)
绪 论	吴洪成	(1)
第一章 唐、宋、元时期重庆的科举		(1)
一、唐代重庆科举的起步		(3)
二、宋代重庆科举的初盛		(6)
(一)滥、严相兼的科举取士		(6)
(二)重庆的科举状况		(8)
(三)重庆科举考试的分析与评议		(14)
三、元代重庆科举的衰落		(17)
第二章 明代重庆的科举		(21)
一、明代科举考试概述		(21)
二、重庆的科举考试		(23)
三、明代重庆、四川进士的区域分布		(39)
四、重庆科举及第士子业绩举要		(42)
(一)蹇义		(42)
(二)江渊		(44)
(三)李实		(45)
(四)江朝宗		(45)

(五)邹智	(46)
(六)舒容	(46)
(七)陈瑞	(48)
(八)刘秋佩	(48)
第三章 清代重庆的科举(上)	(51)
一、重庆科举考试实施概况	(52)
(一)各级科举考试制度	(52)
(二)考试内容、方法及条规	(56)
二、重庆士人中举概述	(62)
第四章 清代重庆的科举(下)	(89)
一、府州县的试院与考棚	(89)
二、宾兴会	(94)
三、重庆的科举考试与四川的比较	(97)
四、人口迁移与四川、重庆的科举考试	(105)
五、重庆科举士子业绩举要	(115)
六、重庆科举考试的废除	(128)
附 录	(131)
参考文献	(142)
后 记	(147)

第一章 唐、宋、元时期重庆的科举

隋唐时期,包括隋、唐、五代,从公元 581 年起至公元 960 年,共计 370 余年。隋朝于公元 581 年建国,公元 618 年灭亡,立国时间很短,但并非在教育上毫无建树,从某种意义上说,隋朝的学校教育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唐朝(618~907 年)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现代史学家、原复旦大学校长周予同先生认为:“唐朝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为复杂而完备。”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朝学制的主要特点;就其学制的完整性来说,不仅当时在亚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即使是与处于同时代的欧洲的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从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封建官学制度的日益完善,而且体现在人才选拔制度上革命性的变革——科举制度的确立。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宋朝分为北宋(960~1127 年)和南宋(1127~1279 年)两个时期。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先后建立了辽(916~1125 年)、金(1115~1234 年)政权。1279 年,我国北方又一少数民族蒙古族灭南宋,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元朝(1271~1368 年)。

宋元时期的文教政策基本内容是尊孔崇儒,提倡佛道,崇尚理

学。该时期,尤其是宋朝,我国的封建政治和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进一步繁荣,封建的教育制度已基本完善。当时学校教育制度仍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而官学又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科举制度的调整与改革,是这一时期教育体制变动的突出特点。

重庆的科举考试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规条及措施的要求下推行的。但由于重庆地偏西南,高山阻隔,民族经济发展滞后,文化教育也难与发达地区媲美。迄今为止,也许是由于历史研究中文献资料可资查考利用的稀少,影响了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有的学者对此从方法论的层面作了很好的概括,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裴娣娜教授指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在用于教育研究时存在一些局限性:(1)历史是按年代顺序,经历了一个时间空间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历史文献常常是滞后记载,历史史料十分零散,很不系统。搜集和考证分析这些史料的困难,影响到历史研究的可靠性。(2)历史文献的理论内容,是经过“加工”的抽象形态,留存着加工者们的主观认识;而历史研究过程对史料的分析取舍,又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包括研究人员的学识、能力、价值观、对史料的掌握程度以及方法论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很容易造成失误。(3)历史研究无法做精确的量的分析。^①

我想,正是上述局限,平添了我们对重庆科举情形的具体理解或整体把握的难度。但是,研究者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尽可能复原客观的历史,并力图进行解读与描摹。

^① 裴娣娜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一、唐代重庆科举的起步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命五品以上京官和总督、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又令文武执事官五品以上者,按十科举人,包括孝悌有闻、德性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其中“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把录取和任用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它历时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风行欧美诸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亦始于此。

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办法。唐高宗李治咸亨年间(670~673)的取士制度,大体分3类:由学馆出身的名“生徒”;由州县考选的名“乡贡”;由皇帝临时设置并亲自主持的名“制举”。设“明经”、“进士”等6科^①,犹以进士为重,但不易中选。唐朝一代,重庆府科举中进士者,合州、万县地区和云阳县各有进士1人,涪陵也有人应试。^②

又据有关方志史料所载:唐代云阳县举子李远高中状元。^③

^①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八卷,《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178页解释,明经,是唐代科举的常设科目,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之别。先帖经、墨义,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及第。录取名额多于进士。进士科人第者约占应试者的百分之一、二,明经科则占十分之一二。

^② 据四川省涪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载:“隋唐时设科举,其时涪州亦有人应试。”又见万县市教育委员会编《万县地区教育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③ 常明修、杨芳灿纂:《四川通志》卷122《选举制·进士》,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刻本。

但其他情况或有关信息在重庆各方志资料及诸多历史典籍均无记载，这可谓遗憾之极。

间丘军(合州人)在唐高宗时期(650~683年)与杜甫祖父杜审言同登进士第。武周载初元年(690年)，他参加洛阳殿试策问，不被启用。唐中宗复位后，安乐公主主持朝政，赏识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太常博士。他能文工书，与陈子昂、杜审言齐名，曾书东蜀《牛头山瑞圣寺碑》、《滇南爨王墓碑》以及《刺史王仁求碑》，书法极佳，被称为当时之极笔。杜甫对其书法作诗《赠蜀僧间丘师兄》^①称颂，诗云：

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
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
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
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
世传间丘笔，峻极逾昆仑。
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
青茨雪岭东，碑碣旧制存。
斯文散都邑，高价越玕璠。
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
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
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
穷愁一挥泪，相遇即诸昆。
我住锦官城，兄居祇树园。
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

^① (唐)杜甫著，高仁标点：《杜甫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页。

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

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

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

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唐代顾非熊有诗《送皇甫司隶赴黔南幕》云：“黔南以事客，禄利向来饶。官受外台屈，家移一舸遥。夜猿声不断，寒木叫微凋。远别因多感，新郎倍寂寥。”据《唐摭言》文称：“恭逢策羸马赴朝，值新进士前导曰：‘回避新郎君。’”可知，唐代又称进士为新郎君。诗歌大意为：外来黔南所有任职官员，薪俸禄利历来比较丰饶。爵位享受刺史之权治理，家小迁移船路途甚遥。那里晚上猿猴声声不断，天寒地冷木叶容易枯凋。你我因为远别依依难舍，同科进士分手倍感寂寥。^①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科举制是一种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选才与育才的标准和要求比较一致，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科举考什么，学校教育也跟着注重什么，这使学校教育完全屈从于科举的要求，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科举制度的流弊也是明显的：国家只重科举考试，忽略学校教育；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表面看来好像公平合理，实际上录取标准仍以权势门第为转移；由于科举指挥棒的影响，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等等。

^① 黄节厚编注：《乌江古代诗词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